传承之光

陕西考古博物馆4月底向公众开放

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

王小蒙

核心阅读

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语言，既是考古的，又是博物馆的，更是将两者结合的科学严谨、生动易懂的叙述体系。这一切，取决于如何让观众读懂考古的语言。

中国的博物馆以历史类博物馆为主。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、考古学科的快速发展，建立考古学科的博物馆，让全民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，是中国考古人的共同心声。

◀耀州窑瓷标本陈列。 王小蒙供图

▶汉代乐舞场景复原。 王小蒙供图

2022年4月底，陕西考古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了。

考古博物馆是在近代考古学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博物馆类型。如果说，历史类博物馆是以人和社会为视角的宏大叙事体系，考古博物馆则是以“物”为着眼点，通过对遗迹和文物的解读，讲出历史大框架下丰满鲜活的日常。

陕西考古博物馆意在勾勒中国考古和陕西考古的发展脉络，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的总体特征，打通从考古发掘到保护、研究、阐释、展示、传播的学科全链条，使公众走近考古、了解考古、爱上考古，共享文化遗产。

将文物标本组合成会讲故事的元素

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语言，既是考古的，又是博物馆的，更是将两者结合的科学严谨、生动易懂的叙述体系。这一切，取决于如何让观众通过展陈读懂考古的语言。

与历史类博物馆展示各类藏品不同，考古博物馆展示的都是考古出土文物。考古博物馆要呈现考古学科的基本点，解读考古是什么、考古怎么做、考古的价值和意义等考古学研究的关键问题，也要兼顾博物馆传统的传播理念，从农业起源、家国体系、手工业技术、文化交流等大主题，讲到衣食住行、吃茶饮酒等生活细节。因此，考古博物馆更强调知识性与丰富性。

作为成立早、规模大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已发掘古代遗址上千处、墓葬数以万计，整理各类文物近20万件（组）。新成立的陕西考古博物馆让这些文化遗产走近公众。一座座城址，一件件器物，一堆堆陶片、漆片、瓷片，构成了重要且丰富的文物标本库，它们是考古人“手铲释天书”所依赖的最直观、最基础的词汇，它们的不同组合方式相当于不同的考古语言。

紧密结合遗迹展示文物，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一大特点。这里的展览，既非艺术展也非历史展，而是按照考古学的逻辑，对一个个遗址进行系统化的解读。丰富的背板资料，体现展陈的特点和亮点。考古线图和现场遗迹照片是各个展陈的标配。遗址分布关系图、城址或墓葬的布局图，可以让观众了解古人的地理观；平剖面图、遗址正射影像图，生动反映古人的营造理念；典型器物分期图、遗物成分测试表，可以让观众读懂文物所反映的技术传承。

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所有文物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，也都有出土时的现场照片。在陕西考古博物馆，有不少展陈是模拟的考古场景。以往，石峁石刻在一些展陈中被单独展示，而在这里被嵌入模拟石墙中，观众可以借此想象石城的规模。墓志和茶酒器具，也被复原展示在模拟北宋吕氏家族墓的场景中。这些都增强了考古现场感，也有利于人们解读文物的功能。

共存和组合关系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对比式的组合陈列，能够清楚反映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演变。我们将陶器的组合与鬲的组合对比展示，反映西周早期不同姓氏文化的差异；通过战国秦墓到秦王朝随葬品的变化，展示早期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；分组陈列唐三彩作坊中不同品类的文物，体现其产品种类和工艺发展；阵列式陈列唐墓的出土仪仗俑，则体现了主人身份的高低。

◀陕西宝鸡石鼓山出土的牺尊。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

我们希望考古博物馆的展陈语言，充满考古的元素，但不是生涩枯燥的术语，而是经过了转换、容易理解的博物馆语言。这需要将现成的考古研究成果再次进行学术审视，从受众的角度进行通俗化剪裁。比如，将遗址器物分期图经过专业合并、归纳，使各期变化特征更鲜明、更易辨认；通过大量图表和绘画呈现手工业制作流程，生动展现手工业的传统与演进，以及审美的变化。

展示考古学家如何“考”、如何得出“考”的结论

对于考古博物馆，遗址本体的展示是最能体现文物保护理念的语言。

从渠树壕汉代砖室壁画墓顶部的星象图中，人们可以看到北斗七星、伏羲、女娲、牛郎织女。为了增强现场感，我们将墓室上部的壁画悬挂在展厅顶部，参观者仰观壁画，就如同置身于原址，会被其深深震撼。学者、历史爱好者也可以通过近距离观看这些壁画，体味历史深处的细节。

我们将一座750多年前的蒲城元代壁画墓“整体打包”入馆。这是一座元代墓葬，顶部为穹窿状，壁画绘于砖墙的白灰上，由“堂中对坐图”“行别献酒图”和“醉归乐舞图”三大部分组成，共有20多个人物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完成了壁画的保护修复工作，使其达到展陈要求，最大限度保护了壁画的原貌。

汉代刻字陶窑切块、西周铜轮牙车马遗迹、丰镐遗址地震喷砂遗址、汉代和明代的道路遗迹展示等，既是中国考古百年的缩影，也串连起关中完整的历史脉络。

按照历史发展序列串起来的展陈，凸显考古学揭示文明起源、多元一体国家的形成，以及文化融合、社会经济等方面。通过这些考古重大项目，充分展示考古学家如何“考”、如何得出“考”的结论。

比如，在丰镐遗址的展陈中，考古学家是如何判断西周丰镐都城的主人就是来自周原呢？考古学家运用了地层学、类型学、文化因素分析等基本理论方法，做出一系列逻辑判断。策展人则通过灰坑地层叠压和陶器实物对比，配合典型陶器组合分期图，并以周人社会组织结构的互动游戏进行深化，将原本抽象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。

再如，北宋吕氏家族墓随葬器物总计1000余件（组），包括餐具、酒具、茶具、香具、文房用具等9个大类。在该遗址的茶具展项中，煮茶、点茶、散茶3种茶具组合并列，配合饮茶场景的宋代文人画，煮茶、分茶的唐宋诗词以及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关于茶具的记载，呈现多样的宋人饮茶场景。这些展项告诉观众，明代才大规模流行的散茶其实在北宋就悄悄出现了。考古发现揭示了文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细节，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，而考古博物馆的展览也可以多角度呈现艺术史、美学史。

中国的博物馆以历史类博物馆为主。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、考古学科的快速发展，建立考古学科的博物馆，让全民共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，是中国考古人的共同心声。期待观众在考古博物馆中，更好认识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。

（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）

制图：**赵偲汝**

考古札记

岁月无声 唯石能言

黄克忠

石刻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类型之一。普通人几乎都能回忆起自己印象中见到过的碑林、碑碣、经幢、岩画、摩崖题刻题记、造像等，可谓种类繁多、丰富多彩、价值非凡。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石刻也是非常鲜明的存在，如我们熟悉的西安碑林、武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（西夏碑）、苏州文庙的宋代石刻、泰山石刻、白鹤梁题刻、老君岩造像、花山岩画等，有的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60多年天南海北从事科技保护工作，我对石刻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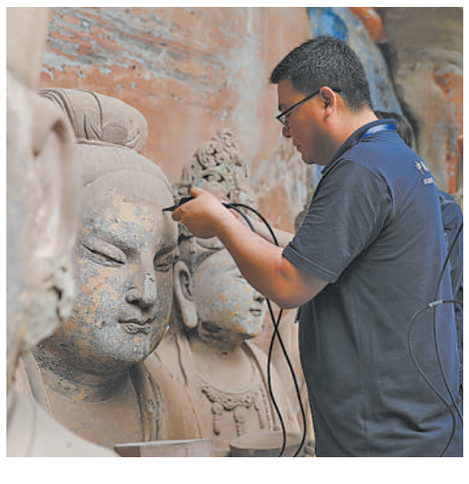
石刻中的书法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，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自商周至现代，书法在不断变化、革新中一脉相承，但有的书法由于年代久远，很少有真迹存留至今，人们只能从一些碑刻中见到它们的真面目。遗憾的是，与其他石质文物一样，岁月越是悠久，石刻的劣化速度就越容易加快，科技保护的力量一直在同这种劣化赛跑。我看到过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唐碑，其字迹正日渐模糊。乐山大佛侧面的天王造像碑，也有字迹在消失。很多的摩崖题刻几年不见，再看到时，也会发现有剥落的痕迹。环境和气候对石刻的影响随处可见。北京居庸关云台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历年都按古建筑维修，但十分精致的元代汉白玉雕刻及六体文字，已到了必须进一步保护的地步。

微环境的持续波动是石刻风化的重要原因，也是石刻保护的难点之一。这些年我们在土遗址、石窟寺等大型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的经验，在此基础上，可以围绕石刻的材质、类型和环境等，开展更为精细、精准、精密的保护研究。比如，石刻与石窟寺雕像的保护修复技术相似，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质地的石刻特性进行专题研究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寺庙群，各种精美华丽的石刻熠熠生辉，堪称无价瑰宝，但风雨的侵蚀导致其表面出现了开裂、酥粉等病害现象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些年对这里的凝灰岩质石刻进行了专题研究、试验，很好地减缓了这类石刻的风化病害。陕西文保中心对石刻的清洗有专门研究，浙江大学、同济大学、西安交大等高校对不同石质文物的保护材料也在进行系统的研究。这都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。

近年来，国家层面启动的石窟寺调查成效显著。与石窟寺相比，石刻分布更广、更分散，北至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的金代亚沟石刻，南至广东珠海高栏岛岩画，东有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，西至西藏日喀则大唐天竺使出铭、新疆昭苏的清代平定准噶尔勒铭碑等。但石刻的历史信息毕竟依附存在于浅表层岩体，受风化作用显著，因此石刻文字史料的信息化留存十分迫切。尤其是对已模糊不清的石刻，我们可利用多维数字采集技术，高精度、微痕提取，还原已看不见的文物信息。石刻与大型岩土文物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数量多、体量小，即使在保护技术、专项保护资金、专业保护人员不足的条件下，也可以探索更多保护研究的方式。

岁月无声，唯石能言。古人通过石刻记录历史、传播文化。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，形成一套关于石刻调查、保护、利用、展示的系统规划，使之抵抗住岁月的侵蚀，传之永久。

（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）



▲文物修复人员正对大足石刻的卧佛摩崖造像进行风化程度的监测。 黄 舒摄（人民视觉）

让博物馆成为“城市会客厅”

徐 坚

从库房到展厅，从馆藏物件到博物馆知识，让公众更多融入博物馆的发展，博物馆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

人们在讨论博物馆的力量时，往往垂青于数字化应用。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，就会发现，几乎所有的新技术都可以被纳入博物馆的展陈或教育模式中，促进其更新和升级。

技术变革的确回答了“如何更有效地释放博物馆力量”这一问题，然而，如何拥有这种独特而强大的力量，同样是博物馆建设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议题。所有的技术变革和提升都是“1”后面的“0”，如何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公共机构，才是所有“0”之前的“1”。

2008年起实施的公立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，是中国的博物馆走向公众的开端，让更多观众回流到博物馆，博物馆才可能成为“城市会客厅”。以此为起点，博物馆应该“归还”更多空间给公众，拉近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不同区域、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。

博物馆对接当下生活，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展览中，库房里的馆藏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不少博物馆已经有意识地扩充馆藏，从奥运火炬到抗疫装备，这些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当代物件都进入到博物馆的库房里。博物馆库房能否承载普通人的日常记忆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2021年是杭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，杭州博物馆启动“百万收藏”计划，面向市民征集1912年以来见证杭州城市变迁和生活变化的藏品。在杭州市民的积极响应下，博物馆仅在半年内就征集到照片、书信、票据、图书、邮票、用具等近4000件藏品。

一些博物馆把展厅“归还”给公众。近年的很多展览，在确保展品安全的前提下，通过陈列可以触摸的青铜器复制品、石器翻模浮雕或者有完善保护设置的标本储存柜等方式，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。

成功的博物馆展览不应是独唱，而应是感同身受的大合唱。2021年洛阳博物馆举办的“上洛：新·乡土志系列展之一”，不仅展示了出土于洛阳的陶俑、经幢等古代文物，还将参观者熟悉的洛阳本地名物搬进了博物馆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，在新中国建设史中曾经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此次特展让拖拉机的模型和其他古代文物一样陈列在展柜中，串联起人们对往日时光的追忆。特展中的双钩书法作品“安乐窝”，取材自司马光等为邵雍在洛阳置办的寓所，展现了古人对居住在洛阳的美好期待。策展团队尝试将这一作品交给观众，邀请观众进行填色、变形和更多的次生创作，将北宋理学家邵雍对洛阳的推崇与当下连接了起来。洛阳博物馆已不是首次推出增强公众参与度的社会教育活动，此前推出的“洛博填色”在线小游戏，让不少参与者在为馆藏文物配色涂色的过程中，获得了对历史文化和工艺传统的全新理解。

从库房到展厅，从馆藏物件到博物馆知识，让公众更多融入博物馆的发展，博物馆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（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）